

从双边到多边 中巴经济走廊的变与不变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沙特阿拉伯驻巴基斯坦大使纳瓦夫·赛义德·马利基日前表示，沙特计划向中巴经济走廊投资90亿美元，并在瓜达尔投资建设大型炼厂。未来，沙特将积极参与瓜达尔各类产业投资项目，并与中国一道，努力将瓜达尔港打造成印度洋上的一颗明珠。这意味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开启了多边合作模式。

“沙特参与到中巴经济走廊相关项目的建设，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真正实现了‘一带一路’建设所倡导的中国创意全球共享。”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告诉记者，参与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是沙特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质性举措。

据了解，沙特提出的“2030愿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为两国在经贸、投资、金融、能源等领域合作奠定了基础。沙特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参与，表明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开放和包容，是“一带一路”建设步入新阶段的良好体现，对“一带一路”的深远发展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巴经济走廊位于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的交汇处，瓜达尔港的区位优势非常显著。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表示，作为OPEC重要成员国、世界最大产油国沙特对瓜达尔港的投资，说明了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建设广受认可，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是用实际行动对来自个别国家的负面声音的有力回击。沙特选择在这里建设大型炼厂，除了表明其看好对瓜达尔港的投资以外，更表明了其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充满信心。

据了解，瓜达尔港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目前正在稳步推进，而距其不远就是举世闻名的霍尔木兹海峡，每年数量可观的油气资源就是通过这条海峡进行运输的。刘英告诉记者：“沙特对瓜达尔港投资，不仅是因为其在‘一带一路’上具有区位优势，更表明沙特对该地区成为交通枢纽、制造业中心和能源网络中心的看好。中巴经济走廊建成后，瓜达尔港将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连接起欧洲与亚洲的庞大能源网络，背后蕴藏的价值不言而喻。”

事实上，不仅是沙特，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国家同样也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充满兴趣。2018年9月10日，英国议会跨党派“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小组正式成立，目的就是帮助英国议会增加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了解，并为英国企业界提供积极参与、寻求机会的平台。而此次沙特的加入，则意味着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建设模式已经从以往的两国双边合作向未来的多边共建进行转变。

胡必亮认为，这样的变化将有助于实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有效减轻建设压力，保障资金供给。刘英则认为，随着更多国家和企业的加入，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有望提速。此外，中巴经济走廊区域一体化发展也将更具活力。

“建设参与方的增加，可以激活中巴经济走廊的市场需求，使设施得到充分利用，让中巴经济走廊能够可持续发展。”胡必亮说。

据刘英介绍，“一带一路”作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截至目前，我国已经与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大约150份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协议或备忘录。在她看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模式从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转变，将有助于提高“一带一路”的建设质量和标准，同时增强建设的国际化和透明度。“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项目，同时也将成为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一个示范性项目。”刘英说。

尽管未来参与的国家可能更多，但中国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却并不会被减弱。“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要考虑的不仅是在经济层面，同时还会加深两国在政治上的互信程度。在经济多样化的过程中，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巴两国的政治信任程度会持续深入。而作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最大参与者，中国和巴基斯坦未来必然会继续紧密合作，关系不会随着合作参与方的增加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胡必亮说。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斯里兰卡南部铁路一期项目1月6日在斯南部城市贝利亚塔举行试通车仪式。该项目于2013年8月开工，一期主体工程建设里程全长26.75公里，连接斯南部城市贝利亚塔和马特勒，设计时速120公里。
新华社发 加扬·萨米拉 摄

良好环境与广阔市场吸引特斯拉在中国建厂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1月7日，位于上海的特斯拉超级工厂一期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规划，该工厂一期年产能可为25万辆纯电动整车，其中包括Model 3等系列车型。从2018年7月与上海市方面正式签署协议，到今年的1月7日上海工厂开工建设，特斯拉只用了短短的不到半年时间。这样的速度令不少人感到惊讶，也展现了特斯拉进入中国市场的急切心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资本运营研究中心主任冯鹏程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企业，特斯拉选择在哪里建厂，目的还是实现企业盈利与价值的最大化。

“当前，中国吸引外资的环境总体上越来越开放，中国的产业政策特别有利于特斯拉的发展。”冯鹏程告诉记者，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公布了一系列的开放措施，其中也包括尽快放宽在华企业外资控股比例限制，特别是汽车行业的限制。“去年6月，《2018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里在原有规定汽车整车制造的中方控股比例不低于50%的基础上，增加了专用车和新能源汽车除外的新条款，这对于特斯拉在中国独资建厂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冯鹏程说。

据了解，目前中国已经连续3年成为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全球第一的国家，市场前景广阔。各级政府也制定了很多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消费者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认可度正在逐年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不少中产阶级以上的消费者将目光瞄准了特斯拉。这些因素也为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冯鹏程表示，中国在将来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强大吸引力。中国的基础设施软硬件配套齐全，产业规模化效益强，集群化效益好。因此，无论是对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具有非常巨大的吸引力。

“然而，当前美国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却在客观上提高了很多企业的生产成本。如果能够在中国建厂，特斯拉所要面临的成本和费用则会相应降低。”在冯鹏程看来，虽然目前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淡去，但考虑到中国外资结构正在向服务业转变，拥有较多高科技人才的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有的竞争力，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高科技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为外资企业树立了信心。一些行业的外资控股比例限制被放开，自贸试验区活力迸发；外资企业开始享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所带来的红利……这些都极大提高了外资企业的运营效率，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冯鹏程表示，对于特斯拉来说，机遇已经摆在面前。

进入中国并在此建厂，预示着特斯拉在未来可以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消费市场，越来越开放的中国投资环境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但同时，选择在中国建厂的特斯拉也并非自此就能高枕无忧。“如果特朗普继续奉行贸易保护政策，像特斯拉这样的企业同样有可能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施压。此外，选择在上海建厂，也意味着特斯拉将必须面对在中国实行本土化过程中的能力挑战。”冯鹏程说。

样本数据分析告诉你：

在华外资银行的分行主要分布在哪儿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我国金融业扩大开放为外资银行在中国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在华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在经营方面存在一些明显的不同，其中一个差异就是在华外资银行普遍不像中资银行那样分支行等营业网点密布全国，和中资银行相比，在华外资银行的营业网点可以说非常少。

记者日前观察分析了51家在华外资银行（请查阅本报官网同题文章），发现这些外资银行一类是在华有法人银行，另一类在华只设有分行。在华法人银行中，大部分银行注册地在上海或北京，两个城市在这一领域竞争激烈，例如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注册地在北京，汇丰

银行（中国）注册地在上海，渣打银行（中国）注册地在上海。但也有极少数例外，合资永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南京，韩资企业银行（中国）注册地在天津。

在华分行数量方面，超过半数外资银行在华分行数量小于或等于5个，在华分行数量超过10个（不含10）的银行只有10家，分别是：恒生银行（中国）、东亚银行（中国）、花旗银行（中国）、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汇丰银行（中国）、南洋商业银行（中国）、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中国）、渣打银行（中国）、韩亚银行（中国）、星展银行（中国）。

其中，汇丰银行（中国）在华分

行数量最多，达47个，其次是东亚银行（中国）30个、渣打银行（中国）28个。由于在华分行数量较多，这几家外资银行在华布局已明显向北上广深之外的众多城市拓展，例如，汇丰银行（中国）已在潮州、河源、唐山等城市设立分行。

进一步观察外资银行分行的地区分布，没有改变的依然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吸引了大量外资银行在此开设分行。分析发现，韩资银行多在东北地区开设分行。例如韩亚银行（中国）在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都设立了分行，韩资友利银行（中国）在沈阳、大连设有分行；港资银行则非常重视在珠三角布局，

例如港资恒生银行（中国）在内地设有14家分行，包括广州分行、深圳分行、东莞分行等，而且在佛山、顺德、中山、惠州、江门均设有支行，在珠三角地区可谓投入很多。

记者平时在和港资银行人员交流时也留意到，他们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非常重视也对其动态很感兴趣。比较有趣的是，外资银行对东北地区尤其是哈尔滨较为重视，东亚银行（中国）、法国兴业银行（中国）、国民银行（中国）、汇丰银行（中国）、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渣打银行（中国）、韩亚银行（中国）7家外资银行都在哈尔滨设有分行。

另外，虽然这些外资银行分行

网络不局限于东部沿海，已经向内陆和中西部地区明显扩展，但这51家外资银行中在西部设有分行的仅有17家，也即约有三分之二外资银行在西部地区没有设立分行。在西部城市中，外资银行比较乐意在西安、成都、重庆、昆明设立分行。

既然分行网点和中资银行相比非常少，外资银行在华怎样凸显竞争力？有外资银行人士告诉记者，虽然营业网点数和分行网络比不过中资银行，差异化经营和在细分领域形成专长是较好的思路，外资银行在跨境金融等业务方面就有较大的竞争优势。

2019年全球差旅风险地图出炉

本报讯（记者 刘国民）2019

年1月8日，国际SOS和化险集团发布了“全球差旅风险地图”2019年版本，同期发布了《2019年全球商业韧性趋势观察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企业当前的差旅政策难以满足当代劳动力不断变化的需求与期望：差旅政策涵盖网络安全内容的企业占比仅有三分之一（33%）；差旅政策考量女性差旅人员特点的企业占比仅有四分之一（26%）；差旅政策涵盖商旅休闲内容和共享经济服务内容的企业占比分别为18%和14%。

《报告》显示，对员工进行差旅风险教育（63%）仍然是确保差旅人员健康与安全的最大挑战，并且日益严峻，今年的调查结果较去年增加了10个百分点。其他较为严峻的挑战依次为：确认员工已阅读行前信息（44%）；进行差旅人员追踪（42%）；在突发事件中与员工保持联系（42%）；具备足够的资源保障员工健康与安全（40%）；企业为保护差旅人员所采取的措施：

在2018年健康与安全措施落实方面，选择“将差旅风险评估纳入差旅审批流程”的受访者占比为42%。其他几个占比较高的选项依次为：实施差旅安全培训（39%）；出行前及差旅期间推送建议邮件（38%）；更新差旅风险政策（不包括多元化相关问题）（36%）；监控并分析健康与安全事件的类型及数量（29%）；实施差旅人员追踪（29%）；提供年度健康体检（28%）。

对此，国际SOS中国医疗总监李侠说：“就降低差旅风险而言，教育和培训至关重要。这些措施能够更好地确保员工顺利完成任务，进而保护员工以及差旅中涉及的商业投资。”

● 项目信息

奥地利企业寻求技术合作

该公司成立于1965年，为家族企业，现有约230名员工，是设计生产用于供暖和发电的生物质能燃烧设备的专业供应商，在欧洲有15个工程、销售和服务办事处，另外还拥有4个海外中心。拟在以下领域与中方企业洽谈合作：利用生物质燃烧取暖和发电项目的规划及交钥匙工程；专利创新产品市场开发，如用于环境保护领域的石油和BTX污染分子吸附器、土壤修复和水质改进领域生物炭等；共同研发新技术。

联系方式：
贸促会驻德国代表处
邮箱：ccpitmu@outlook.com

韩国公司出口钢管螺纹机

公司：
NOORI T&C CO., LTD.
负责人：
LEE, CHUNG-WON
电话：82-31-431-8180
出口产品：钢管螺纹机
网址：www.noorinc.com
（本报编辑部整理）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历史性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截至2017年末中国是全球对外投资存量第二大（1.81万亿美元）来源地，仅次于美国（7.8万亿美元），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居于第三来源地（1582.9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自2001年来，2017年对外直接投资首次出现同比负增长，第一波中资海外并购浪潮回落。2018年海外并购正向低增长，战略并购、价值并购、理性并购日益成为主流，交易结构设计需求日益精进。同时，外资并购第二波浪潮来临。

此外，由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处于底部，二级市场低迷有年，并购重组成为市场重构活力的主要方式，中国进入跨境双向投资时代，股权并购成为主流投资方式

改革开放40年来，从要素禀赋与增长机制来看，我们国民经济发展模式是招商引资和出口导向，现在我们成为利用外资流量第二大

国，仅次于美国，而且中国成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热门投资目的地。

从以进为主变为双向并重，2011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中国利用外资增长速度开始低于中资海外投资增长速度，2014年中资海外直接投资流量超过外商在华投资流量。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582.9亿美元，2017年中国利用外资1363亿美元。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居于全球第二，流量居于全球第三。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820.2亿美元，同比增长5.1%；实际利用外资979.6亿美元，同比增长6.4%。这意味着在走过第一阶段的外资来华投资浪潮，第二阶段的中资海外投资浪潮后，我国迎来第三阶段即双向投资并行的时期。

放眼全球，股权并购是主要的跨境投资方式。全球跨境直接投资的存量90%以上都是股权资产，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量的40%以上为

股权并购。2017年中国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中的80%是采用股权并购的方式进行的，2018年前三季度，中资海外直接投资56%是采用股权并购的方式，同期外商来华投资的53%是股权并购的方式。

中资海外并购第一波浪潮回落，价值投资崛起与投后整合需求突出

2001年中国人世前后，曾掀起第一波外资入境并购潮，2007年因次贷危机而进入低谷。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7亿美元，海外并购约为8.6亿美元。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欧美企业海外收购和投资总体乏力，欧美资产、包括欧美的海外资产处于价格低位。而此時，中国流动性充裕，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需求旺盛，开始了中资海外并购第一波浪潮。2013年，中国以自贸区为先导，继而对外投资行政简化和鼓励措施持续推出，中国企业对外并购年增速达30%左右，这波浪潮在2016年达到顶峰。此后，中国开始在外汇使用和

投资行业上进行规范和约束，并实施窗口管理。同时由于海外投资目的地外国投资审查趋严。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和并购录得入世以来首个负增长，大潮回落。

中国企业经历了这波洗礼，基于产业链的价值并购、战略并购已经成为主流；跨文化整合运营与管理能力正成为当前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最前沿需要和课题。

外资入境并购迎来第二波浪潮，市场化方式和市场化机会增多

随着自2011年以来利用外资增速的相对放缓，如何创新招商引资，驱动经济发展成为重要议题。而财政性资金的股权投资、股权并购早成为地方招商引资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型方式，既为交易提供了低成本融资，又增加地方经济的资本性收益。资本与土地最大的区别是流动性强，具有很强的开放性。2017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提出要创新招商引资的方式，鼓励股权并

购的方式来招商引资。2018年6月国务院发19号文件，鼓励地方政府按照市场化原则建立并购信息库，以利于招商引资。

同时，2017年来，中美之间迎来更为对等互利的经贸关系，外资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推行、股比限制放开，知识产权环境进一步改善，新一轮外资来华投资和并购潮正在形成，制造业和金融等服务业领域正迎来不少外资投资并购。此外，中国资本市场低迷、国民经济处于周期底部，也为外资进入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估值窗口。

前一波外资入华并购浪潮主要是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人，改善治理结构，推进公司治理现代化；当前这一波主要是基于业务协同等战略或财务需要，市场化方式和市场化机会增多，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将在更为对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作者系晨曦集团联合创始人、副总裁）